

唐末農民戰爭略記探

諸葛計





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

诸葛计

天津人民出版社

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

诸 葛 计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79千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70

统一书号： 5072·7

定 价：1.20元

序 言（一）

《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是诸葛计同志的力作。借着是书出版的机会，我非常高兴地将它推荐给广大读者。

本书有很多的优点，它所具有的独创性就是其中之一。大家知道，中国农民战争史是解放后新兴的一门学科，三十多年来的研究，它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的薄弱环节，甚至还有不少的空白点。以农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研究为例，如果缺乏战争实践经验和必备的军事科学知识，要未知难而退，无所措手足，要未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因而一直成为比较烦难的课题。诸葛计同志不畏艰阻，叩关而入，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而使这本书具有了突出的创造性。这一特色，不单在史学研究中，在所有的科学研究中，都是难能可贵的，值得赞扬的。

第二个优点是，本书还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唐末农民战争战略的规律性。唐末农民战争是以大规模的流动作战作为特点并贯彻其始终的。这种形式的作战，以飘风疾雨之势，横扫六合，大开大阖，大起大落，胜利进军之际是如此，而战略撤退时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情况下，是否也有规律性可寻？诸葛计同志用力抓住了这个特点，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分析。他首先分析了唐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指出唐中央统治与地方藩镇、中央内部各派势力、以及

藩镇与藩镇之间的复杂矛盾，为义军实行流动作战造成了客观条件。他又分析了起义军一方，指出义军领导集团中有不少私盐贩，而这些私盐贩一向是靠避实击虚进行活动的，其次起义军还涌进了不少的破产失业的游民，因而起义军本身也具有了流动作战的可能性。上述两个方面所寓存的可能性之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义军领导者对整个战争形势的认识——所谓“藩镇不一，未足制已”，就是对这种认识的概括。唐末农民战争流动作战就是在上述复杂形势下产生的。于此同时，诸葛计同志还分析了各阶段流动作战的特点，指出第一次以革命摇篮为依托、积蓄革命力量同第二次以革命摇篮为依托而发展革命力量是有所不同的；自两广北上到回旋于长江中下游，歼灭唐军高骈部有生力量而后渡淮北上，以及此后的长驱直入、一举攻克长安等一系列军事活动的联贯性和差别性，从而在有声有色地论述了唐末农民战争伟大成就的同时，揭示了它的规律性。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指出：义军领导者对当时战争形势虽然有所认识，但是极其不够的；即使在胜利进军之时，其流动作战也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及至局促于关中一隅以及举行战略撤退之时，这种盲目性就更加严重了。正是这种流动作战战略上的盲目性，导致了唐末农民战争的失败。诸葛计同志所作的有关分析，都是相当深刻的；经过这些分析和综合，唐末农民战争的规律性就被揭示出来了。本书对唐末农民战争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即在于此。

诸葛计同志说，他的这本书是在白天同志的启示下完成的，因而全文收录了白天同志有关唐末农民战争的大纲。白

天同志的大纲与这本书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这样说：没有白天同志的启示，诸葛计同志不易完成这部独具特色的著作；没有诸葛计同志的深入钻研，白天同志的大纲便停留在现有水平上而得不到发扬。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薪传光照，异彩叠现。从这幅醇厚情谊织成的动人画面中，反映了诸葛计同志的良好的学风和值得称道的个人情操。

漆 侠

1984.2.10。

序 言（二）

解放以后，由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史蔚然成风，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受到特殊重视，所以在史学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成为“热门”是理所当然的。回顾三十多年来史学工作者所走过的历程，这方面的成就可以说相当丰硕。

但是如果一分为二地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研究工作是有一些偏向的，如：纯理论问题探讨多，具体的研究相对不足；热情歌颂农民起义多，深入细致的分析相对逊色；研究起义过程时绘形绘声的描写多，对军事战略的分析相对较少。最近诸葛计同志根据白天同志研究唐末农民战争史的遗著《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结合自己的深入钻研，用很大力气写成《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一书（以下简称《初探》），洋洋近二十万言。作者将未刊稿寄给我一份，让我写篇序言，因而得以先睹为快，粗读了一遍。读后的总印象是这本书恰好在上述几个不足的方面有所弥补，这本书的出版应当受到史界同行的重视。

“文化革命”以前，我曾写了一本小册子《唐末农民战争》，篇幅仅十三万字左右。由于自己是从校门走向校门的书生，一生中从未经历过战争，个人毫无实战经验，因而在分析黄巢起义的战略问题时自必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不敢

妄加发挥，写起来不顺手，写出后不满意。白天同志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具有很高的军事理论修养，又长期在部队工作，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由这样的同志来研究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可以说是已经掌握了人体解剖的技术以后再来解剖猴体，自然是得心应手的事。这样，以拙著分析黄巢进军战略部分与诸葛计同志这部著作相比，就不免油然而生后来居上之感。作者用主要力量分析“流寇主义”问题，确实是抓住了要害；《初探》对起义涨潮、退潮时间农民起义的优缺点及其历史作用的分析，是相当精到的。

不论是写篇文章还是著一本书，材料由自己搜集，结论在自己头脑中酝酿成熟，执笔时当然会感到顺理成章，要容易得多。诸葛计同志写这本书的情况却不然。尽管材料是亲自动手搜集的，但看法却有很多部分来源于白天同志的遗著，这样要写得准确、前后不发生矛盾、发挥得比较自如，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探》正是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成功。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诸葛计同志对白天同志的论点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简单因袭，而是有所取舍，有所改变，有所发展。在一本书中既尊重前人的成果而不掠人之美，又能提出独立的见解而不做违心之论，不能不承认这是学风正派的表现。

我最近几年常常感到研究社会科学也应当搞边缘科学。目前已有一部分同志提倡和尝试利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对于这种新生事物，个人的态度是先不轻于表示肯定或否定，不妨由大家广泛试试，根据研究实践来检验这些方法能否使用。但即令这些方法在研究某些问题或某

个问题的某些方面可以运用，它们也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指导下起作用。企图以这些方法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是完全错误的。此外，我认为搞边缘学科应当首先在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间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初探》似乎可以看作就是边缘学科的产物。我之所以这样讲，是由于感到：过去研究历史的史学工作者多不懂军事，真正懂军事科学又有实战经验的同志却往往并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而诸葛计同志与白天同志的合作恰好能做到这两方面的结合。今后搞边缘学科，无非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或者是史学工作者扩大研究领域，再搞一门或几门别的学科，如经济学、国家与法学、军事学……等等；或者是史学工作者与精通别的学科的专业工作者协作。就白天同志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一身而二任焉，兼有两种身份，可惜的是唐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他未竟之业；就诸葛计同志写《初探》而言，可以说是采取了后一种方式。这两种做法都值得提倡。

兹就《初探》问世之机，写了以上几点粗浅的意见，未知作者与读者以为然否。

胡如雷

1982年12月5日

目 录

第一章 唐末的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1)
第一节 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转变.....	(3)
第二节 统治阶级的腐朽，政治局面的败坏.....	(8)
第三节 阶级矛盾的激化，唐廷统治的严重危机.....	(18)
第二章 从大起义的前奏到大起义的爆发.....	(32)
第一节 裴甫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	(32)
第二节 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兵变到两淮农民起义.....	(42)
第三节 唐末农民战争的正式爆发及这次战争 战略阶段的划分.....	(64)
第三章 战略防御前期——依托革命摇篮的作战.....	(70)
第一节 战略防御前期的战况.....	(70)
第二节 曹、濮、郓、沂地区成为革命摇篮的条件.....	(77)
第三节 跳出革命摇篮的正确决策.....	(84)
第四章 战略防御后期——大踏步流动破袭	(88)
第一节 第一次大踏步流动破袭.....	(88)
第二节 两次大踏步流动破袭之间的作战.....	(95)
第三节 第二次大踏步流动破袭.....	(103)
第四节 战略防御后期作战方式的试评.....	(108)
第五章 第一次战略转变阶段——由战略防御 到战略进攻的转变.....	(118)

第一节	两种形同实异作战机动的比较	(118)
第二节	从区域性的优势到全国性的优势	(119)
第三节	战略进攻的准备	(128)
第六章	战略进攻——长驱直入地向前推进	(138)
第一节	第一次北伐	(138)
第二节	两次北伐之间的作战	(145)
第三节	第二次北伐	(150)
第四节	关于占领区和根据地问题 ——黄巢流寇主义试析(上)	(158)
第七章	战略相持阶段——由战略进攻到战略退却的转变	(175)
第一节	战略相持前期	(175)
第二节	战略相持后期	(185)
第八章	战略退却阶段——从战略退却到这次战争的失败	(198)
第一节	战略退却	(198)
第二节	从无后方的作战到无目标的退却 ——黄巢流寇主义试析(下)	(206)
第三节	这次战争的失败	(216)
第九章	唐末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其影响	(226)
	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	白天 (238)
	后记	(265)

第一章 唐末的社会危机和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公元九世纪的下半期，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国内战争，这就是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它以暴风骤雨之势扫荡了李唐王朝的腐朽统治，使之走向崩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列宁在《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一文中曾经指出：

“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经过不断的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①

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这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正是当时社会内部农民和地主两个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最激烈、最尖锐的表现，是唐王朝建立以来，两个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不断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李渊、李世民父子在篡夺隋末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李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强盛王朝

① 《列宁全集》第二六卷，第十二页。

之一。在它前期的一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在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下，使生产发展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文明，使唐帝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及生产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在阶级对抗中进行的。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地主阶级对农民群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唐帝国的这种强盛、发达的背后也隐藏着危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谈到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文明发展的状况时告诉我们：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①

在封建社会里，生产愈是发展，劳动者创造出来的财富愈多，地主阶级剥削的胃口也就愈大，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榨取也就更加残酷。这种现象连当时的封建文人也承认：“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②。当时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从皇帝、王公贵族、大小官僚到一般地主，他们为了满足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七三页。

② 唐人李绅《悯农》诗句。宋人杨万里《发孔镇晨炊漆桥道中纪行》亦有“荒山半寸无遗土，田父何曾一饱来？”的句子，见《诚斋集》卷三二。

己穷奢极欲的需要，无不竞相加紧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使直接生产者陷于贫困和破产的境地，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①的名句，正是当时地主和农民贫富生活对比的真实写照。而且，自唐朝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更是有增无已，愈演愈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怎能不引起两个阶级在政治、经济上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和斗争的激化呢？正是这种冲突和斗争经过不断的重複、集中、扩大和尖锐化，终于形成了唐末社会的严重危机，导致了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转变

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它将唐王朝明显地分成了繁荣向上和走向衰落的前、后两个时期。后期与前期比较，无论是在社会经济结构、还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带根本性的是封建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均田制遭到破坏，为封建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庄园制所取代。

唐朝初年所推行的是自北魏至隋朝就已存在的均田制，它与在此基础上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相结合，构成了唐朝前期强盛的物质基础，使之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封建大帝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中央集权的相对巩固和军事力量的强大。但是，均田令中种种优待地主阶级的规定，却为封

①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唐诗别裁》卷二。

建大土地主兼并小农的土地和侵占公有土地洞开了方便之门，留下了大土地私有者向均田制发动进攻的缺口。所以，到了唐朝中叶，土地兼并的情况便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唐玄宗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下的诏书中就说：

“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远近皆然，因循亦久。”①

可见，这些王公、官僚及豪富之家为了掠占土地，他们什么手段都使了出来。地主阶级疯狂掠占土地，封建私有大土地的日益发展，其直接后果便是：一，使小生产者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土地。正如当时皇帝的敕书中所不得不承认的：“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所在逃散，莫不由兹。”②这种失掉土地的农民，或者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私属，或者成为无业游民，团聚于山林川泽之中，形成“天下户口，逃亡过半”③的局面。这种版籍大坏的情况，不仅使政府的租庸调无法按籍征收，就连原先规定的土地收授之法也失去了凭藉。二，原先由政府控制的公田日益流入私家，变成为他们的私产，即使政府主观上还想实行授田，也因手中无田而难以继续。所以，自北

① 《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田制》。

② 《唐会要》卷八五，《逃户》，宝应元年四月敕。

③ 《旧唐书》卷八八，《韦思恭传·附韦嗣立传》。

魏以来就实行的均田制，到唐中叶终于遭到破坏，迅速地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地主庄园制所取代。

作为唐帝国前期武力凭借的是府兵制，而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亦即有广大自耕农存在的基础之上的。随着均田制的破坏，自耕农的大量破产流亡，府兵的兵员便成了问题，到唐玄宗时甚至出现“宿卫不能给”，“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①的局面。府兵制也终于破坏，为募兵制所代替。

均田、府兵这两项基本制度的破坏，给唐帝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均田制的破坏，农民大量的失地逃亡，使租庸调减少了征收的对象，直接影响到唐帝国的财政收入。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和自身的奢侈生活，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在中央财政收入日减的同时，地方的经济实力却由于封建私有大土地的发展而膨胀起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后，边将可以自由募兵，被召募者成为职业兵，与将帅形成一种固定的私人隶属关系。这样一来，各地的武装力量便完全操在边将之手。他们据险要、专方面，成为“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②的军阀。不仅“赏刑已出，日益骄恣”^③，肆意地加强对人民的掠夺，而且为了抢夺更多的剥削役使对象和财富，相互间展开了不断的攻占杀伐，引起了数十年不断的战争。在长期的战争残害和军阀们的蹂躏之下，

①均见《新唐书》卷五〇，《兵制》。

②《新唐书》卷五〇，《兵制》。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十载二月。

“田畴鞠为茂草”^①，“百姓残于兵盜”^②，社会残破达于极点，人民被推入于痛苦的深渊。

由于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也因为失去基础而不得不让位于两税法。公元780年正式实行的两税法，是把原先的租调杂徭以及诸多新旧征科名目，一切罢之，统统并入两税，

“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它征收的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③在其方行之初，对于已经变得杂乱无章的租庸调法来说，是有其合理和进步方面的。在解决唐朝后期的财政危机上也是起过一定作用的。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贪婪，很快地就使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两税的征收是以实物折钱数输纳的。定税之初，“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当初只输一匹绢便可完纳之税，后来要输两匹才能足额。到两税法实行四十年后的唐穆宗时，更是“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④

本来，两税的税额是按“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及总杂征虚数以为两税恒规”，税额已是很重。而在实际征收上又更增于所定的税额，所谓“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的诏令，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①《陆宣公集》卷五，《奉天遣使宣慰诏道诏》。

②《新唐书》卷五一，《食货一》。

③《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④《新旧唐》卷五二，《食货二》。